

# 书 品

(2008年第1辑)

徐俊 主编

中华书局

---

## 学林忆往

- 王湜华 坐卧书巢里 悠然自点书  
——小雅一廬主人校书摭忆 3
- 姜庆刚 陈梦家与李小缘先生交往的一些史料 14

## 专题书评

- 李祚唐 得天独厚 功到事成  
——杜泽逊《四库存目标注》评介 17

## 序跋录

- 王瑞来 《朝野类要》前言 21
- 蒋寅 《周亮工全集》序 27

## 评书论学

- 熊国祯 精粹之作,倾囊相授  
——郑重推荐《闲谈写对联》 29
- 曹旅宁 今朝嘉话更蒐拾,再续藏书纪事诗  
——读《黄永年古籍序跋述论集》 33
- 顾农 欧阳修《六一诗话》的意义 37
- 曾昭聪 释语言 品民俗 赏文学  
——读《冯梦龙民歌集三种注解》 44
- 刘深 清词研究的新创获  
——读《常州词派通论》 49
- 陈希亮 严复思想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  
——读《严复评传》 53

曹培根	区域藏书研究的新成果 ——评《福建藏书家传略》	59
赵兴勤	庄一拂《古典戏曲存目汇考》续补	62
王 珊	读《魏晋诗人与政治》	69
<b>读书札记</b>		
丁 超	元代只孙校尉札记	71
冯春龙	关于赵烈文和《能静居日记》	76
<b>商榷篇</b>		
伊 强	《新序详注》校正	80
刘 飏	《〈比丘尼传〉校注》校点商榷	82
赵承中	《千顷堂书目》勘误一则	88
<b>二十四史点校本档案选 13</b>		
宋云彬先生	关于《史记》标点错误的检讨	90
<b>书苑撷英</b>		
池田温	《敦煌文书的世界》	马明达《说剑丛稿》(增订本)
李宝臣	《礼不远人——走近明清京师礼制文化》	

---

主办单位:中华书局 主编:徐 俊 副主编:沈致金

编辑:《书品》编辑部 责任编辑:梁 彦

邮编:100073 地址: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

电话:(010)63458236 传真:(010)63458226

印刷:北京未来科技研究所印刷厂 订购处:全国各地邮局

国外代号:1369BM 国外发行: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(北京 399 信箱)

国内代号:18—206 国内发行:河北省廊坊市邮政局

网址:www.zhbc.com.cn 电子信箱:shupin@zhbc.com.cn

# 坐卧书巢里 悠然自点书<sup>①</sup>

——小雅一廛主人校书摭忆

● 王湜华

## 选注《史记选》

开明书店公私合营，与青年出版社合并，成立中国青年出版社（以下简称中青社），王伯祥先生任第一届中青社秘书长。

此时挚友郑振铎正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，兼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，何其芳任副所长，正为加强文学研究力量而奔走。当时伯祥先生的老友俞平伯、钱锺书等已先后调入文研所，振铎先生来邀，伯祥先生便毅然离中青社，调到文研所去任研究员了。

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后，伯祥先生担任的第一项研究任务即是选注一部《史记选》。

伯祥先生向以熟悉史籍版本著称。在铸版缩印《二十五史》时，即为每一史编有参考书目，附于各史之后。书目分五类，甲、本书之异本；乙、关于本书之参证质疑者；丙、关于本书之增补整理者；丁、关于本书之赏析评论者；戊、关于本书之博闻广征者。当然，因二十五部历史本身之不同，参考书目之详略亦各异。而头一类即是本书之异本，亦版本之异同。所以伯祥先生的任务虽只是选注，并非全注，但首先的第一项工作，即找来《史记》的各重要版本进行汇校。因为《史记》既是一部上古至西汉的通史，却又总与后来的断代史等合在一起，被称为《十七史》、《二十一史》、《二十四

---

① 节选自王湜华著《王伯祥传》，中华书局即出。

史》直至《二十五史》，而且总是各史之首，足见它地位之重要。不仅史学地位重要，而且文学地位亦不亚于史学地位。文学研究所要推出《史记选》，自然侧重在它的文学价值，所以这部《史记选》的副标题是“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校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之二”（因为本书出版时已到1957年，文学研究所已由北京大学划归中国科学院隶属了。后来科学院又分成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院，文研所当然又改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）。但既要编校，首先必须全书一百三十篇通校，所以伯祥先生在各版本文字异同的校订上下的功夫，要比选定篇目后作注要多得多。关于校勘，伯祥先生在《史记选序例》中写了这样一段话：

校勘古书是批判接受文化遗产的第一步工作。因为传本中语句的“异”“同”，固然要引起解释的纠纷，就是字面的“正”“讹”也会影响到意义的分歧，所以历来严谨的学者往往对古书的校勘是不惮烦琐，不避迂拙地干着的。这一选本的任务虽没有搞校勘专业的必要，但为了帮助批判接受加一点力，乘便向读者提供几条校勘的例子，想来也不是多余的。因此把手头容易得到的复刻《宋蜀大字本》（简称《蜀本》）、复刻《百衲宋本》（简称《百衲本》）、影印南宋黄善夫刻本（简称《黄本》）、原刻汲古阁《十七史》本（简称《汲古本》）和日本排印的泷川资言的《史记会注考证》本（简称《会注本》）来跟采定的《张校本》互相对勘，凡文字的异同正讹，一一随手作成“校记”若干则，散附在各篇的注释之中。

伯祥先生所选用的这些版本，自然是《史记》版本中的最主要者。《张校本》的全称应是《张文虎校刻本》，张文虎把刘宋时裴骈的《集解》、唐代司马贞的《索隐》，与张守节的《正义》，所谓三家注全都收入外，还罗列了他所及见的旧刻古本、时本和别人的校本十四种，一并校入，所以张校本虽后出，却有集大成之功，所以伯祥先生选它作为底本而参校上述各本。

《史记选》篇目之选定，也主要是从文学价值考虑的，但伯祥先

生既突出了文学性，侧重在可读性，还照顾到了史学意义。所以他在《序例》中还写道：

这个选本的目的，在于试向一般爱好文艺的读者介绍这部祖国文学遗产的名著，同时提供一个便于诵读的本子。因此，只选了描写生动而故事性较强的记叙文二十篇，凡是“表”“志”和其它偏重年代、世系或议论的“纪”“传”概从割舍。为要保持原来的面目，入选的各篇都照录全文，不加删节；篇次的前后也悉照原本的顺序。但移写的形式却照现今的惯例，每篇都分段提行，施行标点。

要读通古文，首当其冲的难点在于断句，连句都读不断，根本就谈不上懂，其它就都更甭说了。所以古籍的整理，第一位的工作在施加标点，其次才谈得上注释与赏析。这部《史记选》之所以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受各地各界的欢迎，久盛不衰，一版再版到无法统计确实发行数，其根本原因即在于它标点精到，注释详备，使读者只要一册在手，即把可能产生疑问的难点都已一一解释清楚了。只要读者是有心人，认认真真逐句细读，逐条注文对照着读，那么每句每词都定能读通读懂，从而读毕全书后，基本上于文言文可以过关。

为什么这部《史记选》有如此功效呢？因为伯祥先生在逐字逐词注释讲解通之后还不算全部完成，还逐句予以串讲，也等于逐句都翻译白话。不但翻译，还将原句中的关键字旁加上黑点，让读者清清楚楚看到，文言是怎么可以翻译成白话的。这一方面早在选注《春秋左传读本》时就已用过，只是那时用的是△号，现在用的是中心黑点；那时串讲还是用的文言，当然比《左传》原文要浅显得多，而现在用的则是纯白话。如此为读者设身处地的考虑，为读者不厌其烦的详注详读，难怪一代代读者都十分欢迎这部《史记选》。之所以印数之难以统计精确，是因为“文革”期间纸型被部队拿去翻印，竟没有明确的印数记载。而从还回来的纸型已无法再用来看，其印数应该是不会很少的吧！

## 《史记选》出版前前后后

《史记选》从1950、1951年间开始着手工作，当然在版本校勘上花去了不少时间，为什么直到1957年4月才出版呢？只因排印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波折，翻工了一次，耽误了不少时间。

伯祥先生的原稿是十分清清楚楚的，毛笔字竖行书写，规范的繁体字，排字工人是十分欢迎的。但不知何因，竟让排了简体字，结果问题就产生了。

伯祥先生的注文称“校释”，因为其中包括校订文字异同与注释两个内容。尤其在“校”的部分往往多甲作乙之类。但一排简体后，便出现了大量的甲作甲或乙作乙之类，完全失去了文字校订的意义。校样一来，一开始他还耐着性子去校，越校越生气，直到忍无可忍，便通过所里向出版社提出，必须改排繁体。最后居然同意改排，但已多花了多少冤枉力气，浪费了多少冤枉时间。等《史记选》印行问世，该出版社内部六位同人合作选注的《史记选注》已早出版了。

但由于伯祥先生选注功夫的扎实，虽晚出一步也不要紧，社会认可的还是他的《史记选》，它经得起时代的考验。从出版之日来算，也已半个世纪了，它仍常销不衰。

《史记选》第二版时附插了重大史事的地图，是另一位历史地理学家专门绘制的，很有参考价值，伯祥先生对此十分赞赏。“文革”开始，出版社出于“爱护”，怕伯祥先生观点陈旧，建议将《史记选序例》一文中介绍司马迁生平的部分删去，换上包遵信“大批判”式的一篇代序。伯祥先生也只得表示同意，甚至表示愿意将《序例》全文删除。后来出版社的人也觉得不好意思了，便把《序例》中的主干删去，只剩下干巴巴的一头一尾。这强加包遵信代序的版本，又不知印了多少版，包括上节所述部队借纸型去自己印，印数无法统计。所以到改革开放后还须重印时，只得重新排版了。此时出版社编辑来与笔者商量，看如何处理好？我首先提出：是否删

去包遵信的代序，恢复《序例》全文原貌。出版社也同意了，但说：因为印了那么多版的包遵信代序本，还没有付过他稿费，是否重印第一版还附上，支了稿费后，以后再删去？笔者觉得出版社言之极实事求是，也有一定的苦衷，也就作出了让步。也难怪，“文革”期间是没有稿费一说的，虽代序强加在伯祥先生的《史记选》上印了很多很多，却没付过他一分钱稿费，大概也是事实，所以这样变通的做法也只好接受了。重排本仍用繁体，但改成了横排。

### 《度椽偶识》

1967年秋，伯祥先生的老友陈乃乾先生一日过访小雅一廛，二位老人自浩劫开始至此，虽未受太大冲击，但彼此见到对方多独自寂寞枯坐，感触良多。乃乾先生真是深知家父之心者。家父一生喜蓄书，与乃乾先生的关系也太密切了，不但多数书之购得，多承乃乾先生鼎力相助；家父喜在得书后，于书衣或书中其它空白处随手作题记，亦多让乃乾先生过目，而且内容亦多与他有关。所以，乃乾先生见家父空闲正多，难以遣日，遂劝家父不妨将所有书上的题记抄录在一起，既是往事的有趣回忆，又是排忧解难之良方。伯祥先生听他一席话，十分欣同，便选用荣宝斋发售的磁青封面，十行朱丝格五十页的毛边纸本来抄录书上的题跋。因为伯祥先生在陆续购书时即陆续录目，先叫做《图籍录存簿目》，一·二八以后，则改署《度架随录》，所以这部自己录存的题记，即命名为《度椽偶识》。椽，即架之异体字。首先在第一册之开首，作了大段题记，亦正是编集本书之缘起。文曰：

予自识字辨物，便好书册。……岁辛酉（1921），馆涵芬楼（商务印书馆编译所），遂定居沪北。积十年，所贮图书已盈一室。……辛壬之交（即1931至1932年间），倭突寇沪，寓所适罹兵冲，扶携幼弱，仓皇出走，仅以身免，屋宇器物，尽付一炬，盖与所主涵芬楼同其命运矣！事稍定，移砚齐辉堂（开明书店编译所，兼主图书馆）。结习难忘，又稍稍购书。此后二十年

中，埋头编撰，罕接他事。转得陆续与友相亲，每有所获，渐还旧观。及全国解放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奠都北京，予乃举家北迁，其时有书二万余卷，捆载俱行，卜居于东城旧黄华坊之小雅宝胡同，始得式瞻新猷，同受一廛而为光天之新民矣。乃理架陈书，自署所居曰“小雅一廛”以志庆。……年来耄荒日甚，记诵锐退，每忆前尘，恍同隔世。……况先妻下世，已历一纪。虽儿孙盈庭，而各勤所事，且多散处外省者，詎能专顾老人？即同院随侍之人，亦皆上班入学，会面时稀。除晨夕起居暂一告语外，予则终日枯坐，伊忧寡欢，舍亲书无复聊生。偶感疲掩卷，亦无非效达摩之面壁、司空之仰屋而已。一日，吾友陈乃乾见过，悉予近状，谓予曰：“君盍彙集手识书衣之语。比次而观之，可以志时遇，可以感欣戚，顾不足以俛仰自得也乎！”盖余喜涂抹，每获一书，辍摩挲数四，然后入架。偶有所感，随手著数语，亦仅识得书岁月，及当时情境而止，未能于书旨有所发明，及详究版本之异同也。等闲视之，搁置久忘矣！比闻乃乾所云，不能无动，遂思抽架检索，苟有可观，录而存之，目之曰“度椽偶识”。

自此开始，先以记忆犹新，并常置手头，随时翻阅的几部入手，逐一抄存，很快，不到两个月，已将手头所有的三个空白本都抄满了。虽肯定尚未抄完，尚有遗漏，但即将这三本分标卷一、卷二、卷三之后，封面上却已用朱笔标明“上、中、下”字样，并在卷三之末页，又附记一则云：

发篋检书，似易实匪易，盖必先逆忆某书置何处，某书曾否题有识语，然后上攀下蹲以探索之。设无壮力为助，殆弗克济胜也。因是，必待湜儿休假在家，予乃得纵横如欲以命之，此戔戔三卷，竟近两月始观成。此中消息，从可知矣！虽然，必尚有遗漏。今后如续有发见，或更有新制，当别为续录以存之。七十八容叟后记。时丁未十一月初五日。

最后，《度椽偶识续编》的第三册都已写了半本多。末了一则

是《乾隆以来系年要录未竟稿》。录毕，还写下了如下附记：

一九七五年五月五日，(目奇)叟记于京寓，时年八十六。

目眊几不能下笔，强持以竟之，掷笔茫茫，真如堕五里雾中矣！

明日立夏，更感岁序之催人耳。

此时，离他的心脏停止跳动，只有半年多了。

伯祥先生身后，笔者又在《皮椽偶识续编》三之后，又补录了若干则题跋，包括为陈友琴先生所题扇面，及为陈友琴先生所藏《唐明州阿育王寺常住田碑》所题长跋，以及为谢刚主先生《悔馀存稿》所作题记、为顾颉刚先生《顾氏纯熙堂藏〈书林扬觝〉》所作题记。虽不是为他自己的藏书所作，但亦属藏书图籍类文字，所以笔者亦一一自家父友好家借归抄在《皮椽偶识续编》之后。亦聊存为《偶识》辑佚补遗之意。

### 两次点阅《四库提要》

伯祥先生在《湘刻本 轩语书目答问》长跋中，有“又奔走庸书之暇，曾两度点阅《四库提要》，且以断句之本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，以是益恣流略之学”等语。有关此事，当用专节来略加叙述。流略，是指九流七略之书，亦为书籍代称。流略之学，即指目录学。

伯祥先生原藏有粤刻本《四库提要》，并且还点读过一遍。可惜此本已毁于一·二八战火。一·二八之后重新添置，还不止一部，但都是小字本。其一为点石斋石印本，附《研经室外集》，共二十本。这是一部巾箱本，亦可称袖珍本，即开本比一般书小，约10cm×20cm，所以字非常小，要通读一遍是相当费眼睛的；另一本为中华图书馆的缩印本，字亦小。这部点石斋本的书根是伯祥先生自己书写的，端严而齐整，摆在书架上，远远望去，这些书根字就像肃立的一排排精兵，正在整队操练，真令人肃然起敬。

举家迁京后，伯祥先生又托乃乾先生添置了一套同治七年广东书局重刊本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》，凡二百卷，一百一十二册，分别用八副木夹板，亦可算是八函。之所以要添置这一部，目的非常

明确，就是想用它再点读一遍。购得此本时，伯祥先生已六十九岁，一时仿佛又重遇久违的老朋友，便在首册的封面上作了则简单的题记：

粤刻《四库总目提要》，旧尝蓄此，且曾手点一过。辛壬之交，倭犯淞沪，罹于燹。其后获点石斋及中华图书馆两缩印本，聊资翻检，而字小费力，时不免萦念曩帙。二十五六年来，每往来胸中，迄未一遇此本。今夏之孟，以乃乾之介，得此于隆福寺街修绠堂。是帙固非奇文秘册，以余视之，如逢旧雨，如获至宝，盖香火因缘有难于翫置者在焉，爰乐而记其端。容叟记于小雅一廛，时年六十有九，岁次戊戌（1958）。

得此本后，果然他又用朱笔圈点了一遍。可惜点毕未再作记，已不详其年月了。后来中华书局要缩印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，知伯祥先生通点过此书，便将这部圈点本借去，过录在他们的底本上再缩印。这样便大大方便了今后的读者。所以在一巨册的缩印本《出版说明》的最后，有“本书由王伯祥先生断句”的字样。

这部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，无论乾隆皇帝如何假此举行文字狱之实，无论他怎么篡改与禁毁，它只是一个方面。在当时盛世，能有此结集，并能合众人之力编写出这部《提要》，都是集大成的壮举。后人要治旧学，要在传统文化方面再有进一步的发扬光大，《四库全书》与这部《四库提要》无论如何也是跳不过的。伯祥先生一生通点了两遍，并能用他的圈点来帮助代代后学方便使用这部《提要》，实亦应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工程啊！

### 复点《资治通鉴补》

明代学人嘉定严永思（衍）认为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侧重在资治，所以详于朝章国典而略于高逸节侠，所以和他的学生谈允厚一起，就“高逸节侠”方面应该补入的，逐一补入。所采列之书，除《十七史》之外，旁及列朝别史，乃至稗说之可征信者。前后下了三十年的功夫，方克毕工，是部十分重要、史学价值极高的难能之作。

但乾隆时编修《四库全书》时竟遗漏了它。伯祥先生一向十分重视它。它的卷数与《资治通鉴》一致，也是二百九十四卷，但字数却涨出了很多很多。伯祥先生所藏的一部凡八十册。1960年他开始点读，直到1963年夏历十二月，才点读了一遍，即在首册封面上作了题记云：

《资治通鉴补》二百九十四卷。明嘉定严永思(衍)即胡注《通鉴》补缺正误。其门人谈允厚参之。皆毕力以赴乃克成。《明史·艺文志》著录，而乾隆修《四库书》竟遗之。钱竹汀(大昕)为作《严先生传》以张之。咸丰初年，江夏童和豫始用聚珍板排印，顾流传仍希。光绪丙子(二年，1876)武进思补楼盛氏复据童本校印，即此本也。解放后第一庚子(1960)，予始专意点读。荏苒至癸卯(1963)嘉平之月乃毕业。涉历勘得，良用愧怍。巽老人，初十日晨窗记，时年七十有四。

这么一部大部头的巨著，对于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来说，能通读一遍，已属十分不容易，何况还是正襟危坐用朱笔施点地细读！

1972年初，伯祥先生觉得上一遍读得还不够细，加上记忆力日衰，前看后忘。为了加深记忆而重头再读一遍。他在读毕第一卷，也正好是第一册时，正好末页有半张空白，便用墨笔又作了段记：

一九七二年一月廿五日，实辛亥岁十二月初十日乙卯，开卷重读，上距初读之时，已隔十有一载。幸左目尚可辨字，将逐日展阅，以竟厥终云。翌日下午五时乃毕。(目奇)叟记之时年八十有二。

有志者，事竟成。读第二遍的过程中，伯祥先生还大病了一场，高血压眩晕症，幸亏及时针灸，恢复得尚好，但病后走路已较困难。虽病，犹不废读，稍稍康复后更努力地继续点读。于1973年1月23日，竟已点读毕第二遍。耄耋之年还这样努力，这种精神有多么了不起啊！

还必须一提的是，那时伯祥先生已被迫停记日记，因为记日记之后果每有不堪设想者。文革之中不出事则已，一旦有事，日记必

能构成罪行，成为被人用来攻打自己的炮弹。而记了半个世纪以上从不间断的伯祥先生，一旦辍笔，实在很不习惯。所以他读第二遍时的另一目的即是，每读毕一卷必作记，以代替日记。卷尾有空格空行，即记于空格空行；若没有，则记之于眉端。如原来日记之详述一日事已不可能，而当时子女及第三代多在干校或外地，所以卷尾眉端所记，往往侧重书信来往与友朋往来。而已毕竟不是日记，也做不到每天必读一卷，所以书中所记形式亦至灵活，变化多样。例如卷二百六十四之末及卷二百六十五之右，伯祥先生记道：

壬子十一月廿二日灯下阅毕。〔卷尾空两行，第一行已有朱笔记，此为第二行记〕

傍晚接元孙廿四号复信，详告工作状况，情绪甚高兴。

又接林宜廿二号信，告二月间将回京做产。〔此两则为卷尾眉记〕

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廿七日写信复寄元孙及敷衍。

陈礼生来访，杂问稗史诸事，至午留饭不肯，应说下次再来饭而去。

廿八晨写信复林宜、升基。

午饭后读此卷。接清回太原手书，因刚复士敷，未复。下午接琴媳廿六信，询茂疾，并托人致白药（茂同学代往人教社取来）。至于分配何地及何时分配，当然谈不到，更何论调回北京乎！〔此三则记于卷首之眉上〕

由上引这几则来看，已不难看出他老人家当时的孤独与寂寞。我们兄弟姊妹要说还真不少，而“文革”期间竟几乎全不在他身边，就算留在北京的，白天也都要上班上学，有时往往晚上还要学习或加班，等回到家，见老人屋灯已闭，也只好轻轻在窗下报一声，回来了。不报一声怕他通宵失眠睡不好；报了，又怕吵醒了他。……总之，他白天的孤寂是可想而知的，所以他亦只有努力点读，才能聊解寂寞，打发时光。

这部《资治通鉴补》原来没有书套，书亦比较破旧，似系某图书

馆散出之物。经伯祥先生通点两遍，遂成了他重要的手泽。所以他身后捐书时没有捐走。后来我特地从北图要来了不少废书套（因为北图当时制度混乱，凡入藏有套的精装本，一律将套扔掉，怕发生架上只存套而书丢失等事），用布票买了青布，将硬书套两张裱在一起，再请中国书店书友王志鹏先生来帮忙，因为他手艺高强，会修书、补书、做金镶玉等之外，还会做书套。他又是袁行云先生的好朋友，常帮助袁先生修书补书。于是我也请他来帮我做书套，《通鉴补》凡八十册，每八册装一函，共装十函。记得前后三四个礼拜天，都请王先生来我家，我做他的下手，居然为这部珍贵的手泽配齐了十个书套。

更为可贵的是：书套做好后，我把这来龙去脉告诉了启功先生，他很嘉许我的所作所为，慨允为十个书套上的签条一一题签。每一函题写书名“资治通鉴补第几函”之外，第一函还加题“王伯祥先生点读本”，第十函则署上“一九七八年一月启功敬题”的款。这部本来取阅都较为困难的旧书，经此加函与题检，顿时焕发出非凡的辉光，成为家藏中重宝之一。

（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，王伯祥断句，中华书局 1965 年影印出版；

《资治通鉴补》，王伯祥点读，将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；

《度稼偶识》，王伯祥著，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）

# 陈梦家与李小缘先生交往的一些史料

● 姜庆刚

陈梦家先生是现代著名古文字学家、考古学家、诗人。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法律系，1932年入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学习，后改学古文字学。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任教。1944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讲授古文字学，1947年在游历英国、法国、丹麦、荷兰、瑞典等国后，于同年秋回到清华大学任教。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，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，曾任《考古学报》编委、《考古通讯》副主编等职。在反右运动中，不幸被错划为右派，梦家先生在当时困难的境况里依然坚持学术研究工作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。但在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中，梦家先生受到批斗，含恨离世，年仅55岁，实在是学术界的一大损失。

最近笔者整理李小缘先生（李小缘先生情况详见2007年第五期《书品》）的部分书信以及藏书，其中有些资料涉及到陈梦家先生，对于了解两位先生的生平及当时学术界的情况略有帮助，特整理出来，以飨读者。

小缘先生赐鉴：

前借商先生为拙稿书耑，承念至感，惟因少写一字，故特将商先生原书寄还，敬烦转交（因据其来书又曰下乡也）。此间正议迁川，人心殊多不安，现闻已定一年级在川上课，其他院系亦拟逐步入川，大约仪器书籍先行，而本学期仍旧在此上课也。将来校址大约在叙永一带，近日越南之事甚紧，战事难免，则入川拜晤之期当不甚遥。北平图书馆书随联大入川后，此工作又多阻难，为之奈何？知后特问，并请教安。陈制梦家谨上。九月二十一日。昆明平郑街88号。

此信的右上角有“29年9月26日收到”几个铅笔字。民国二十九年是1940年，当时陈梦家先生在西南联大任教。信中所提到的西南联大准备迁至四川的原因是：当年9月日军占领越南，云南形势危急，而且昆明经常遭受日军飞机的轰炸，所以有迁址四川的计划。而北平图书馆在1938年3月随当时在湖南长沙的临时大学迁往昆明，设立北平图书馆昆明办事处。这对于西南联大的学术研究很有帮助，因为北大、清华、南开各自学校图书馆的藏书很多没有来得及运往大后方，所以陈梦家先生对于北平图书馆书籍将要迁走感到非常遗憾。由于种种原因，西南联大没有再次搬迁，而是一直坚守在昆明，直到抗战胜利。

信中提到的商先生，是指商承祚（1902～1991），著名古文字学家、考古学家、书法家，字锡永。曾在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等高校任教，当时在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。

小缘先生赐鉴：

圆通寺一别，忽忽七八年矣。顷奉手教，拜悉一一，承费神时，拙作寄来尤为感激。弟去秋十月初返平，公私而忙，致未先期致信，至觉歉仄。弟在美曾与哈佛、燕京合作，研究在美中国古铜，常得与叶理海君畅谈，彼对贵所工作颇加赞赏，想为先生所乐闻者也。近来清华亦于考古一门略事扩张，稍查收藏古物，为学生观摩之用。不悉贵所最近有何发展（新出版专刊否？），尚祈见告。余下久已迁居它处，家母等现在沪上，此间工作较繁，一时未能南来，前次小石先生曾邀赴中大，亦不能如愿，甚觉怅惘也。专此并请撰安。陈梦家拜上。三月廿四。外汇劳转致谢扶雅先生。

此信用纸为“国立清华大学用笺”，有1951年4月17日收到的记录，当时梦家先生在清华大学任教。信中提到的几位学术人物分别是：叶理海，指 Serge Elisseeff（1889～1975），法籍俄裔学者。现在多译为叶理绥，哈佛燕京学社首任社长（1934至1956年）。胡小石（1888～1962），著名学者、书法家。名光炜，字小石。历任北

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、武昌高等师范学校、金陵大学、东南大学、中央大学等校教授。1949年后任南京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等职。谢扶雅(1892~1991),著名基督教学家、翻译家。浙江绍兴人,曾留学日本,参加中华革命党。后入美国芝加哥、哈佛等大学研读西洋哲学与宗教学,曾任岭南大学教授。

信中提到的圆通寺是昆明最古老的佛教寺院之一,已经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。根据李小缘先生的行程来看,似乎梦家先生记忆有误,李小缘先生到昆明是在1939年,距离写信时的1951年,不止七八年,而是十二年了。

另外还有陈梦家先生写给李小缘先生的一张便条:“兹介绍余施水兰夫人于李小缘先生(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)。浙江上虞陈梦家。余夫人研究戏剧,于中国古代艺术尤有兴趣,请予以研究上之方便,实为至幸。”只是不知其中提到的余夫人的情况,还望读者不吝赐教。

在李小缘先生的藏书中,有一册是陈梦家先生的签名本,《五行之起源》(《燕京学报》二十四期抽印本,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出版)。封面有“小缘先生教正,陈梦家谨上。二十八年八月 昆明”的字迹,当时李小缘先生在昆明参加史学会会议。

而另外一册《小学研究》,是金陵大学文学院国学研究班出版的一份刊物,有刘国钧、胡光炜、徐复、曾昭燏、游寿、高文、朱锦江等人的文章,主要是涉及文字学方面,在本书的末页,有李小缘先生的两行铅笔字:“末文题曰《读契文举例》,曾昭燏著,裁下以应梦家兄之需。缘1953年六月十九日记。”原来是李小缘先生为了梦家先生的学术研究之需要,将自己心爱的藏书中的文章裁去,从这件小事也可见两位先生的友谊之深。曾昭燏(1909~1964),著名考古学家,中央大学毕业,伦敦大学考古学硕士,曾任南京博物院院长。

以上书信及藏书经历了战火与动荡不安的年代,保存至今,十分珍贵。只是不知陈梦家先生的遗物中是否还保存有李小缘先生的书信,如能有机会公布出来,对于我们了解两位学界前辈大有帮助也。